

幸运男孩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

〔美〕托马斯·伯根索尔 著

杨柳、杨力军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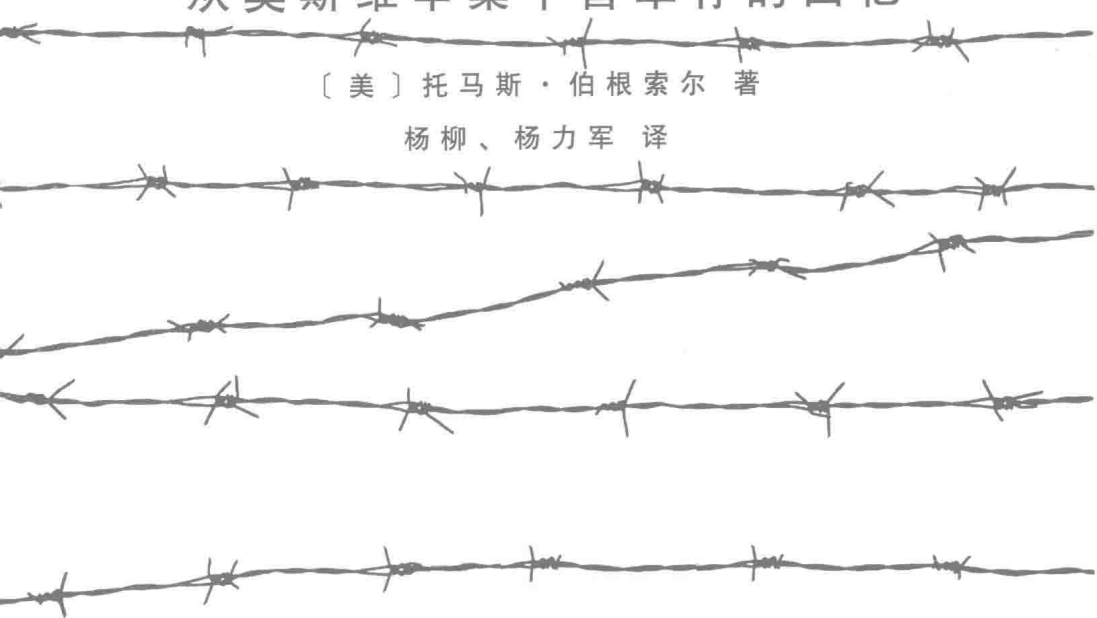


幸运男孩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

[美] 托马斯·伯根索尔 著

杨柳、杨力军 译



Copyright © 2007, 2009 by Thomas Buergenthal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 / (美) 伯根索尔著；杨柳，
杨力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2

(文化生活译丛)

ISBN 978 - 7 - 108 - 05541 - 5

I. ①幸… II. ①伯… ②杨… ③杨… III. ①回忆录—美国—现代
IV. ①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1083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装帧设计 何 浩

责任印制 崔华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字 数 153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谨以此书缅怀我的父亲和母亲
——穆戴克和格尔达·伯根索尔，
你们的爱、你们坚贞的性格，
以及你们真诚有信的美德，赋予我写作的灵感。

中文版序

刘大群*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美国教授伯根索尔先生的自传——《幸运男孩》(*A Lucky Child: A Memoir of Surviving Auschwitz As a Young Boy*)一书的中文版。作者以平和的心态、简练的语言，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回忆了自己在波兰犹太人隔离区、凯尔采强迫劳动营和德国纳粹集中营度过的悲惨童年，回忆了战后他如何历经千辛万苦与母亲团圆以及战后求学的简单经历。作者让读者直接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启迪每一个人的人性良知，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去体会、去思考。

荷兰海牙——国际公认的国际法之都，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和人物的地方。2000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我为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刚到海牙不久，时任国际法院副院长的史久镛法官就告诉我，新就任的美国法官伯根索尔教授曾是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谈虎色变的地方，是纳粹德国时期建立的最主要的集中营和灭绝营，从1940年到1945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估计约有110万

* 刘大群，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庭、卢旺达国际刑庭上诉庭法官。

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超过九成遇害人都是犹太人。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红军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只找到7650名幸存者，其中有130名儿童。

一个人如何从世界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杀人魔窟走进了世界上最崇高、最正义的法律殿堂，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在海牙的一次学术活动上，我认识了伯根索尔法官，当我问他如何能从德国纳粹集中营中经历九死一生，幸存下来时，他沉思片刻后说：“我只是幸运而已。”这个回答难免令人失望，其实幸运只是他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一个因素，他对生命的渴望、面对死亡威胁永不放弃的精神和勇气，以及在极其残酷的环境下学会求生，才是他能生存下来的主要因素。他的回答背后包含了多少辛酸的回忆，包含了他对那个时代纳粹集权统治的控诉，也包含了作者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后的觉醒。

2007年，《幸运男孩》的德文版在德国首先出版。2009年，该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一时间，成为年度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发行。《每日邮报》评论道：“托马斯·伯根索尔并没有呈现给你一个普通的悲惨故事。他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展示了他在道德上的成熟过程。此书的意蕴值得我们深思。他本人的经历就是非凡的传奇，他只是朴实无华地将其表述出来。”《幸运男孩》的英文版出版之后，他也送了我一本。当我问他，为什么事件发生六十多年后，才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许多人也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年轻时也写过一些文章，回忆我在波兰隔离区和纳粹集中营度过的日子。但是，这些文章充满了仇恨和报复的情绪。这是我心智尚未成熟的表现，只要罪犯得到了惩罚，有关国家进行

了道歉，我们就应该向前看；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们应该致力于研究为什么人类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为什么会不断发生人类自相屠杀的现象，找出办法来破解这种恶性循环，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一味自桎于过去的苦难之中。在书中，我并没有对这些问题提出我的见解，而是要读者自己去考虑这些问题。”伯根索尔教授提出的人性价值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牢记历史就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自纳粹犯下灭绝犹太人的罪行后，战后七十年，虽然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但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屠杀却没有停止过。上世纪70年代，在信奉佛教的柬埔寨，250万人死于非命，死亡人数占全国人口的1/4。1994年，号称非洲“千山之国、祥和之地”的卢旺达发生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短短70天内有70万人丧生。其杀人速度竟超过了纳粹的焚尸炉。1995年，在一向和平安定的欧洲也发生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7000多名16岁到60岁的平民在一周内惨遭杀害。为什么人类自相残杀的历史到了21世纪还没有结束？人类怎样才能防止重复过去的错误呢？

不忘记过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关键在于教育下一代。伯根索尔教授说：“我们的学校、宗教机构和国家都有义务培养我们的子孙后代，使他们具有识别、抵制煽动仇恨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意志以及能力。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军事院校和宗教机构都必须教育下一代，要让他们能够不分种族、宗教、民族、人种出身或

性取向，宽容和尊重其他人。我们的政治领导者、我们的政府都有义务确保这样做。”

首先，我们要教育下一代杜绝“有罪不罚”的现象。在上个世纪以前，犯下国际社会最严重罪行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应得的惩罚，在一些文化体系中，这些罪犯甚至被奉为英雄神明。在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里，你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在历史上杀人越多的人，他的塑像也就越大、越雄伟。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为此，国际社会成立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来审判这些罪犯，开创了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的先河。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又成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庭、卢旺达国际刑庭、国际刑事法院、柬埔寨特别法庭、塞拉利昂国际法庭、黎巴嫩国际刑庭，以伸张国际正义。这些法庭的成立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凡是被指控犯下国际罪行的人，无论他们躲到天涯海角，无论他们犯下的罪行过去了多少年，国际社会也会将他们缉拿归案，使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2015年，德国吕内堡法院开庭审判前德国党卫军成员，93岁的奥斯卡·格罗宁被指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了共谋谋杀罪。在德国纳粹的杀人机器中，有许多像格罗宁、艾克曼这样的人，他们具有工作的责任心，认真负责地做好本职工作，是整个机器上的螺丝钉，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的技术责任，而不是自己的道德责任。由于“机器”过于庞大，环节过于繁杂，有些人因而看不到这部机器末端最终杀人的结果；有些人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宁愿充当罪行的参与者，成为别人犯罪的执行人。

不忘记过去，不但要牢记过去的苦难，还要记住那些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人。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谴责日本有关当局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行径时，我们可曾想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与拯救受难者的人们？他们的事迹可曾出现在中国的教科书里？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以前可曾听说过约翰·拉贝、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约翰·马吉等人的名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何凤山的所作所为？如果你参观过上海世博会，走进以色列馆，最吸引人注意的，不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手稿，也不是《死海古卷》中的《圣经》手稿，而是正对该馆大门墙上悬挂着一个中国人的肖像，他就是何凤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驻维也纳总领馆的总领事。他曾不顾南京政府的反对，给3万—5万犹太人发放了签证，使他们能逃离纳粹的魔爪，来到了中国上海。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你不觉得你的知识结构中缺少了什么吗？

不忘记过去，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灭绝种族罪行的发生，除了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外，对个人来说，还有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每个人都必须有做人的底线，这就是人性与良知、人道与包容。侵犯生存权是最严重、最恶劣，也是最不可饶恕的侵犯人权。年轻人要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不盲从，不信邪。在这个世界上，最残酷、最血腥、最严重的犯罪往往都是在最崇高、最高尚、最诱人的口号与旗帜下实

施的。灭绝人性的行为来自灭绝人性的理论，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铺满了鲜花。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而上台的，在他执政的前期得到了几乎全体德国人民的拥护。但不出几年的时间，他就把德意志民族领上了万劫不复的罪恶之路。对于第三帝国的兴起与暴行，其他的德国人难道没有一点儿责任吗？如果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在道德与道义上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他们毕竟为希特勒走上独裁的道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每个人心底蕴藏的良善道德情感，是我们培育人类共有价值观最深厚的土壤。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宣布的原则，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出身、财产等。这不仅合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而且具有普世的意义。任何杀人合法化、杀人合理化和杀人神圣化的理论与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与唾弃，培育和践行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的价值观，关系到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每个公民的价值取向。

不忘记过去，还要求我们彻底摈斥那种“平庸之罪恶”，那种面对相互残杀，还熟视无睹、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心态。面对国际罪行时，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要么同流合污，助纣为虐；要么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要么奋起反抗。由于国际犯罪的本质是否定与践踏人类共同具有的根本价值，因此，在纳粹集中营里对犹太人的屠杀，针对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灭绝罪，针对的不仅仅是卢旺达的图西族人，在斯雷

布雷尼察发生的大屠杀的受害人，也不仅仅是波黑穆斯林，而针对的是整个人类，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这种对人类良知的肆意侵犯，如果我们保持沉默，不揭露、不反抗，那么，你我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德国教士、反纳粹活动家马丁·尼默勒在 1947 年曾经说过：

当他们抓共产党人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关押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
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民主党人；
当他们搜捕工会成员时，
我还是一声不吭，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我依旧沉默不语，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¹

伯根索尔教授曾经说过：“‘奥斯维辛悲剧永不重演’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信念，即建设一个全人类都能和平并有尊严地生活、其人权都能得到充分尊重的世界。我的这些反思也代表了所有坚信这个信念的人们。”

1 马丁·尼默勒 (Friedrich Gustav Emil 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此为他的著名诗歌《最先他们逮捕共产党员》。

我认为，他的话也代表了所有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让我们永远铭记历史、缅怀先贤、伸张正义、开创未来。

2015年5月11日于荷兰海牙

前 言

这本书也许在很多年前，也就是说，在我对书中描述的事件还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应该撰写。但是自从 1951 年我到美国后，一直忙于学业、事业和家庭，这种生活使我几乎无暇顾及过去的事情。这也可能是，在潜意识中，我觉得我需要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沉淀才能写出我早年的生活，因为时间能使我以更超然的心态来看待我的童年遭遇，可以使我在写作时不至于陷入对细节的描写，而更能突出我现在所认为的故事重点。书中记录的整个经历对我人格的形成有着持续和长远的影响。

当然，我心里一直都明白，总有一天我会讲述我的故事。我必须讲给我的孩子们、孙子们。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一个孩子是如何经历了大屠杀、如何在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我在饭桌上和家庭聚会时给我的孩子们讲过一些片段，但是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讲过。毕竟，那不是讲述这种故事的恰当地场合。但是这是一个必须要讲述并且流传下去的故事，特别是一个在大屠杀中被实际毁灭了的家庭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才能重建我们家庭联结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举例来说，我从来没有特地告诉过我的孩子们，我的父母在战争中是如何表现的，以及当其他人在相似的情况下失去了道德准则时，

他们所展现的坚强性格。有关他们的勇气和正直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家族历史，这些绝对不能随我百年之后一起被埋入地下。

我还想把我的遭遇讲述给更多的听众，不是因为我认为我早期的生活是多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件，而是因为我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我们只有通过大屠杀幸存者们的眼睛来看大屠杀才能完全了解大屠杀。说到大屠杀，人们通常用 600 万这个数字来概括，这种说法在无意中使受害者成为非人类化的数字符号，而且淡化了这场人类史上惨烈的悲剧。这些数字将受害者转化为一群可代替的、没有名字也没有灵魂的躯体，无视他们曾经作为人类的个体。我们每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都有一个自己值得去讲述的故事，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一张鲜活的面孔。像所有的悲剧一样，大屠杀中也产生了英雄和恶人，有从来没有丧失人性的普通人，也有那些为了自己活命或者仅仅为了一块面包，就帮助纳粹把其他人送进了毒气室的人。还有在这场大屠杀中一些没有丧失人性的德国人的故事。

对于我来说，每个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都在大屠杀历史中增添了有价值的一笔。这些遭遇使我们加深了对这场灾难性事件的了解。这场灾难不仅永远毁灭了欧洲犹太人本身，还毁灭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和性格。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记忆当中的那个孩子的口吻来讲述我的遭遇，而不是以一个老者的身份回顾这段生活。后一种方式将会失去原汁原味，无法真实反映出一个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孩子当时所见证的一切。

这本书是我对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的回忆。这些回忆肯定带有被岁月流逝和岁数增长所捉弄的痕迹，比如：有的人名忘记了，

有的记得不准确了，有些事实和事件发生的先后日期和顺序可能记混淆了；有些事件的发生可能和我描述的有出入，或者有些事情我以为我是亲眼目睹的，但事实上可能只是听闻的。由于我没能提早动手写这本书，我已经不可能再去征询和我一起在集中营里生活过的其他幸存者的意见，或者将我对特定事件的回忆与他们的回忆相对比。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然而，最令我遗憾的是：我没有和我的母亲讨论过这些事情的细节。此外，尽管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要让我明确区分哪些事是我亲眼所见的，哪些是我父母讲给我听的，哪些是我从他们谈话中听到的，我觉得，即使有可能分清楚，那也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在写这本书的前两章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我只能说，在我写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每件事我都记得非常清楚，桩桩件件历历在目，如同亲身经历。

虽然本书的章节是根据时间顺序编排的，但是我在每章中提到的具体事件或情节不一定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叙述的。这么多年来，我经常能够非常清晰地回忆起特定的事件或情节，但是不能确定它们发生的具体时间。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日期和时间对我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我努力回忆我那段生活岁月时，我发现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年月日的时间概念，不像现在的我，时间概念很强。我是在集中营里长大的，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的生活方式，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活下去，挨过一小时算一小时，挨过一天算一天。那就是我的思维模式。我只计算我们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下一顿饭，或者计算距离门格勒医生可能采取的下一轮死亡筛选行动还剩几天。比如：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1944年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具体日期，我是在咨

询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档案馆后才得知确切日期的。我从互联网上查到了凯尔采犹太人隔离区大清洗的日期，查到了我被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具体日子。我为写这本书所查阅的资料范围仅限于此，其余的故事都是基于我的回忆写出来的。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曾在一个学院的文学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奥斯维辛死亡之旅，尝试着讲述了我的一些故事。如果那时我就写了这本书，那么这个回忆录一定表达了一种更直接的感受。那时我还没受到岁月流逝给记忆，特别是痛苦的记忆带来的影响，我还能清晰地记起我对死亡的恐惧，我经受过的饥饿，与父母分开时笼罩在我心中的那种失落无助、没有安全的感觉，以及亲眼目睹恐怖情形时的反应。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大屠杀以来生活的变迁，这些感受和情绪都已淡化了。作为本书的作者，我相信读者同样会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对此我很抱歉。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些感受和情绪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的话，那么，严重的心理创伤会使我很难走出大屠杀的阴影。

大屠杀的经历对我一生人格的形成，对我成为国际法教授、人权律师和国际法官的生涯都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无论我在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很显然，是我过去的经历把我引上了人权和国际法的道路。无论如何，它为我提供了成为一名更好的人权律师所需的东西，因为我不仅在知识方面而且在情感上懂得一个因人权遭到践踏的受害者的境遇。毕竟，身历其境，刻骨铭心。

目 录

中文版序.....	刘大群	1
前 言.....		1
第一章 从卢布赫那到波兰.....		1
第二章 卡托维兹.....		21
第三章 凯尔采犹太人隔离区.....		32
第四章 奥斯维辛集中营.....		53
第五章 奥斯维辛死亡之旅.....		73
第六章 解放.....		82
第七章 在波兰军队的日子.....		96
第八章 渴望团聚.....		110
第九章 新的开始.....		127
第十章 在德国的生活.....		136
第十一章 去美国.....		163
结束语.....		173
后 记.....		188
附录：六十年后对奥斯维辛的反思.....		190
关于作者.....		201